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3 年第 3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3 年 5 月 20 日

编者按

1. 知识产权保护、模仿与南方自主创新····· 庄子银 丁文君
2. 双重晋升层级、声誉与雇员专用性技能获得····· 李晓颖 张凤林
3. 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及局限····· 靳卫东
4. 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研究····· 邹红 喻开志
5. 人口政策鱼和熊掌能否兼得——基于财政教育支出的视角····· 杨龙见 陈建伟 徐琰超
6. 农业经济增长与污染性要素投入的关系····· 杜江 罗珺
7. 长期保障、投资回报与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 石智雷 易成栋
8. 研发投入对企业 TFP 的溢出效应····· 李静 彭飞 毛德凤
9. 论货币数量规则的有效性····· 吴吉林 黄辰
10. 中国货币替代程度及其对福利的影响估计····· 吴锦顺
11. 国家发改委成品油调价对能源类股票收益率的影响····· 柳明 杨运泽 孙文鑫
12. 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就业效应的地区差异····· 张金英 石美遐
13. 从省际贸易成本看我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 许统生 洪勇 涂远芬 黄先明
14. 美元区位分布的条件与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 丁一兵 钟阳
15. 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政治经济学····· 周克
16.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附加值贸易：还原真实的国际贸易····· 王岚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 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 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 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知识产权保护、模仿与南方自主创新

庄子银 丁文君 (武汉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专利保护,通常被认为是打击模仿、激励创新的主要手段。如果只考虑一次独立的创新活动,例如发明白炽灯,诚然专利以临时垄断为代价激励创新。然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创新已经很少以这种独立的形式出现。高科技行业的创新往往建立在已有专利的基础上。新产品(如平板电脑)的发明,动辄要引用成百上千件他人的专利。这些专利权像樊篱一样妨碍创新。有时,创新采取“破坏性创造”的形式。新发明的产品淘汰已有的专利品(windows 系统代替 dos 系统),又被后续创新取代(win7 代替 windows xp)。在电脑和软件行业,创新是顺序推进的,各个研究者采取互补的研发途径。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严格的专利保护为创新制造阻碍,而模仿能够改善社会甚至被模仿者的福利。

发展中国家(南方)专利保护的效应更加复杂。自从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社会各界就对发展中国家应当执行怎样的保护标准争论不休。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国际利润配置的作用,把穷国的消费者福利作为垄断利润输送到发达国家(北方)。严格的专利保护阻碍了南方企业以模仿的形式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堵塞了日本、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曾采取的“抄中学”的增长路径,但也会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激励外商以直接投资、技术许可等正规途径转移技术。文献显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效应与创新的性质有关。如果北方创新发明新的产品,南方专利保护就会促进创新和直接投资,并导致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如果北方创新是以高质量的产品淘汰旧产品,南方专利保护就会阻碍创新和技术转移。

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2 年,中国专利申请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其中大部分申请来自本国居民及企业。尽管不能单纯以专利申请的数量作为创新的指标,但数据已经足够引起学界对南方创新的重视。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综合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模仿、外国直接投资和自主创新的影响,才能制定最有助于国计民生的知识产权战略。

我们考虑北方和南方对一系列产品进行质量创新的产品周期。其中南方创新只能建立在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基础上,研发周期较长,技术成果有被模仿的风险。因此南方企业在与北方的创新竞赛中处于劣势。南方只对跨国公司产品进行创新。而北方只对不受专利保护的模仿品进行创新。北方企业完成创新以后,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南方。这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但也增加了产品被模仿和被创新的风险。模仿品经过北方企业创新以后,回到北方生产,完成一个产品周期。

南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决定了跨国公司和自主创新企业被模仿的风险,影响北方直接投

资决策和南方创新决策,进而影响北方创新。模仿风险下降使自主创新和直接投资的预期回报增加,对南方创新和直接投资产生激励。跨国公司和南方创新企业的份额瞬时增加,使得南方劳动需求增加,北方劳动需求减少。因此北方相对工资和总支出下降,市场需求减少。这导致创新的预期利润降低,世界生产劳动需求减少,对南北创新和直接投资都产生负效应。在新的均衡中,北方创新率、南方创新率和直接投资率下降。北方产品和模仿产品的份额上升,跨国公司和自主创新产品份额下降。因此,在质量创新结构下,模仿强度上升能够促进产品周期,对北方创新和南方创新都具有正效应。

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本国的技术水平和战略目标策略的选择知识产权战略,以达到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在化学、医药等产品创新行业,宜采取较严格的专利保护。在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行业,则可以采取略为宽松的保护水平。这对于自主创新和发达国家创新都是有利的。

2. 双重晋升层级、声誉与雇员专用性技能获得

李晓颖 张凤林(东北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关于雇员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文献研究通常认为会存在以下激励问题:如果技能的获得无法通过合约证实并实施,雇员专用性技能的获得会面临一个道德风险问题——雇员对其技能的获得会要求企业支付一个溢价(premium),与此同时,一旦技能已经获得,企业没有激励支付这个溢价。因此,在一个子博弈完备均衡中雇员专用性技能投资不足。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制度安排,其中以晋升制度的设计最为典型。

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设计企业内的晋升制度:一个角度是只考虑了企业内的垂直晋升层级(vertical ranks),另一个角度是只考虑了企业内的水平晋升层级(horizontal ranks)。具体地,垂直层级是与特定的工作职位相关的,在各个层级中具有不同的权利与责任,在垂直层级间的晋升视为垂直晋升;水平层级是根据地位和工资将同一垂直层级内的雇员区分为不同的等级,而晋升到较高的水平层级本身并不意味着权利、责任甚至工作类型的变化,在水平层级间的晋升视为水平晋升。在这种层级结构中,雇员的工资往往与其所在的层级相挂钩。然而,上述两种单纯从垂直层级或水平层级来设计的晋升制度无法同时实现雇员专用性技能获得的激励与配置效率,会产生一定的无效率,并且都是基于企业与雇员一次性博弈的环境研究不完全雇佣合约的自我实施,并没有考虑企业对声誉的关注以及关系合约的作用。这里我们考虑一种既存在垂直晋升层级又存在水平晋升层级的企业双重层级(科层)结构,在一个重复博弈的框架中引入基于声誉的关系合约,分析双重层级结构对雇员技能获得的激励以及效率问题。这也为理解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与声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上,这种双重晋升层级存在于许多企业或组织的实践中,该分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合理的解释。

分析结果发现,在企业具有一定声誉资本的情况下,对于雇员获得技能的激励,双重晋升层级结构是优于简单的垂直晋升层级和简单的水平晋升层级结构的薪酬支付体系,并且对于一个有足够耐心或远见的企业,也即声誉较高的企业,双重晋升层级结构可以同时实现对雇员技能获得的激励以及有效的工作配置。企业对声誉的关注会提高雇员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并且社会总剩余增加,企业利润增加。

上述结论意味着应该鼓励和保护企业形成声誉的机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式制度不完善、非正式制度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声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制和行政管理的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事实上,信任或诚信问题一度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当然,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社会信念结构对于声誉效应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企业向雇员提供明确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与薪酬支付体系对于这种双重晋升层级结构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于中国在经济转型阶段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及建构有效的企业微观人力资本开发机制有着一定的启示。

3. 实证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及局限

靳卫东 (山东财经大学)

《实证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及其方法论局限》,《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近年来,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十分缓慢。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原创性不足,仍然停留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吸收与利用;二是盲目批判和错误使用西方经济理论的现象还十分普遍。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学者普遍缺少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入思考。

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研究一般是采用了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假设-演绎模式。这种研究模式逐渐将经济学研究塑造为一个提出假设、逻辑演绎和计量检验的程序化过程。不同方法论的区别就突出表现在对经济假设的认识差异,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逻辑演绎和计量检验的功能定位和使用原则等方面。综合分析这些区别,以此来认识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及局限,可以消除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盲目批判和过度信心。在我国,逻辑演绎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而经济学研究却逐步积累了对计量检验的极大信心,所以从科学哲学出发,重点讨论逻辑演绎的意义以及计量检验的局限,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经验主义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事实、感觉和经验为依据的科学,其假设必须是来源于事实归纳。但是,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则认为,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是自知的,以人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应该通过人类的自我考察和内省来提出先验为真的假设。依靠这些先验为真的假设,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就可以得到综合为真的所有经济理论。另外,一些学者试图避开对经济假设来源的讨论,认为经济理论的优劣是决定于其预测力,这与经济假设的来源无关,甚至“越是真实的经济理论,其假设可能越不真实”。综合这三种不同认识,经济假设确实可以分为真实程度有别的三种类型,即公理性假设、理论假设和限制性假设。

在三类假设划分的框架下，逻辑演绎可以使经济理论更加符合一致性、逻辑自洽性、简洁性和有效性的科学原则，具有验证理论假设、发现潜在规律以及清晰解释经济现象的功能。首先，逻辑演绎具有重要的理论验证功能。利用经济模型，逐步放宽限制性假设，去除所有的理想化陈述，理论假设可以还原为潜在的经济现象。如果理论假设的还原对象符合客观事实，就说明它是真实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明它没有被证伪，能够被暂时接受。其次，很多理论假设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主要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不能依靠直接观察来认识，还需要逻辑演绎去逐步发现。最后，逻辑演绎借助于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数学推导，能够更加精确地刻画经济概念，用简洁的语言让人们理解复杂的现象。只是，逻辑演绎的理论验证功能还存在着不充分决定性问题，而使用数理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也容易产生对形式化数学知识的过度依赖。

计量检验是借助于经验数据和计量技术，对理论假设进行概率分析，从而在有限范围内发挥理论验证和理论发现功能。它首先是在概率意义上确定计量模型参数是否与理论分析有所不同，以及计量模型的结构和内容是否解释了理论假设所描述的因果趋势律。这不是完全意义的证实，也不是真正的证伪，而是基于现有计量技术在概率意义上对理论假设的实证主义意义做出的不完全评判。其次，在三类假设划分的框架下，使用回溯推理来发挥计量检验的理论发现功能，也面临着样本选择和不完全决定性问题。

总之，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日趋多元化，深入讨论实证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及局限，一方面可以促使更多经济学者关注科学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也必然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中国经济研究

4. 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研究

邹红 喻开志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改革开放来,我国城乡家庭收入较快增长,衣食住行用的条件明显改善,而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和消费内部结构差异程度也在不断加剧。以往侧重于分析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研究一直被学者们所忽略。而相比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更能准确反映家庭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深入分析家庭各种消费不平等的大小,厘清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对于当前我国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入不平等一定大于消费不平等吗?基于 2000-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进行度量,结果发现两种不平等基本呈不断增长之势,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 0.326-0.366 之间波动,消费基尼系数在 0.32-0.384 之间变化。从 2005 年开始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这可能由于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消费差距;也可能由于城镇居民出于逃避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信息以免泄露等原因,收入数据存在明显低报。这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消费不平等大小更能准确反应家庭的福利水平差异,政府在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应重视居民间不断扩大的消费差距。通过进一步分析非耐用品消费内部差距的相对状况和时间趋势,研究发现:食物消费不平等(0.3 以下)显著小于各种消费不平等;服务消费不平等(0.433~0.502)远远高于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0.320~0.384);住房和汽车消费不平等不断增长且位居高位;家庭享受发展型与生存型消费的支出结构差距一直位居高位;家庭性别资源配置差距呈现倒 U 型趋势。

利用出生组与年龄效应分解方法,我们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讨论了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基于不同出生组的不平等效应比较,相比更年老的出生组(1940 年代、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更年轻的出生组(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存在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和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基于同一出生组两种不同的不平等效应比较,更年老出生组的收入不平等效应大于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效应,而更年轻的出生组的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效应大于收入不平等效应。相对于 23 岁基准年龄,30 岁及以后的户主家庭面临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的程度随年龄增加越来越高。消费不平等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性上升趋势,在 23~30 岁之间,可能刚开始组建年轻家庭,没有小孩,养老和健康支出也较少,消费不平等显著上升再下降。55~65 岁之间,有些家庭老年有稳定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而有些家庭却要今后的养老和健康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消费不平等又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利用回归方程分解方法,我们探讨了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不平等和总消费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各年对两种消费差距的贡献度均达到了 40% 以上。与

总消费差距相比,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更为拉大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差距,2009年收入对文化娱乐消费差距的贡献度达到了47.7%。说明缩小消费差距的根本仍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可以降低基本生存型消费的不平等,更能降低享受发展型消费的不平等,这大于布兰德尔(2008)发现的发达国家收入冲击作用于消费不平等20%的贡献程度和保险平滑机制效应。对于总消费差距而言,区域、家庭规模 and 教育的贡献度位居其次,而对于文化娱乐消费差距而言,教育、职业和区域的贡献度排在第二类重要因素。

降低消费不平等是改善民生和增进福利的重要途径。如何降低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我们认为:第一,降低收入不平等是降低消费不平等的根本。第二,降低受教育程度不平等是缩小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长期路径。第三,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服务业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第四,完善消费刺激政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短期手段。

5.人口政策鱼和熊掌能否兼得——基于财政教育支出的视角

杨龙见 陈建伟(北京师范大学)、徐琰超(云南大学)

《财政教育支出降低了人口出生率?》,《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但人口政策的完善与计划生育政策并不矛盾。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人口问题上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们可以把国家政策导向解读为两个重点:一是降低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人口质量。那么,有没有同时兼具两项功能的政策工具呢?

传统理论认为,财政教育支出能够提高国家的人力资本均衡水平,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经济学家贝克尔·盖里和刘易斯·格雷格于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Q-Q权衡理论(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theory),即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和对孩子质量投资方面进行权衡决策。Q-Q理论成为研究人口生育率的一个开创性框架,其衍生出的一个重要政策意义是,财政教育支出有助于降低人口数量。

该结论的提出在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从过去几十年的国际经验来看,尤其对于有些发达国家,确实存在这种趋势。例如19世纪中期普鲁士强化义务教育立法之后,家庭对孩子进行质量投资的相对价格降低,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提高,从而降低了人口生育率,加速了人口转型。

我们认为,财政教育支出改变了居民面临的人力资本投资价格,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而影响个体最优生育决策。一方面,更多的财政教育支出减少了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开支,相当于提高了家庭的实际收入,从而生育子女的数量会增加(消费水平和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都会增加),这可以理解为政府教育支出影响生育行为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财政教育支出用于发展公立教育,相当于降低居民所面临的人力资本投资价格,促使居民选择用人力资本投资来替代生育孩子的数量,这可以理解为政府教育支出影响生育

行为的“替代效应”。政府教育支出增加对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要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综合对比。如果替代效应超过了收入效应，则总效应为负。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财政教育支出和人口生育率数据的波动拟合成一条曲线的话，就会发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政府大力发展教育，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因此，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财政教育支出无疑发挥着提高人口质量和降低人口数量的双重作用。

中国人口转变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多重挑战，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是当前人口政策的核心内容。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应该是在个人对生育率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实现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质量的协调发展。在对中国人口政策争议颇多的今天，财政教育支出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条较为温和的思路，即在人口转型过程中，政府完全能够采取间接引导的方式（提高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实现人口政策的过渡和衔接，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降低人口生育率，从而实现“鱼和熊掌兼得”的目标。

6. 农业经济增长与污染性要素投入的关系

杜江（武汉工业学院）、罗璐（武汉军械士官学校）

《农业经济增长与污染性要素投入——基于简约式及结构式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关注重点。近些年，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与农村发展正常有序，这无不与政府的重视密切相关。但与此同时，农业与农村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并日趋严重。特别地，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等化学投入品（污染性要素）使用所造成的面源污染问题业已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我们试图分析农业经济增长与这些污染性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按照环境经济学领域的著名观点：伴随着经济增长（发展），环境污染程度逐渐加深，环境质量降低；但当经过了一个临界点（拐点）后，环境污染程度转而逐渐减轻，环境质量提高。那么农业经济增长与污染性要素投入之间是否也表现出类似的规律？即，是否随着农业发展，污染性要素投入先增多后降低？进一步地，污染性要素投入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利用大量的数据及实测模型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研究成果对变量进行选择，我们将单位播种面积污染性要素投入作为环境变量，以人均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增长状况，同时还考虑了农业领域的资本-劳动比、农业经济规模、农业贸易开放度、城乡收入不平等、国民经济结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相对变动等因素。

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农业发展，化肥投入所表现出的先增后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农药投入的这一特征不明显，农膜投入则没有这种变化趋势。第二，将临界点对应的人均农业产值与目前全国及各地的实际值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污染性要素投入将会随着农业增长而进一步增多。第三，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污染性要素投入正相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降低污

染性要素投入；经济结构的变动（农业比重变化）对不同投入的影响不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动对农药投入具有显著影响，进而对农民生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第四，总体来讲，农业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技术效应、农业发展产生的规模效应、农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效应及农业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所表现出的贸易效应均使得污染性要素投入增加，农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加深。

全球化背景下，农业增长与环境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这涉及到农业生产规模和产出水平、农业生产结构及土地利用状况、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农业技术、农业与贸易政策、环境规制措施等一系列因素。此外，农业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短期内不宜显现并被人识别。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基于有限的数据与资料展开分析，为进一步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尝试。这一领域今后的深入研究还要依赖于更为完备的理论基础及数据积累。

7. 长期保障、投资回报与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

石智雷 易成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国外学术界对劳动力回流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模型，如生命周期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事实上，这些回流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迁移者经济和非经济的回流动机，但也只是对于处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或者某一特定区域的劳动力回流现象的解释，对于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往复式流动及长期“半城市化”现象并不能提供有力的解释。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民工潮”未退，政府仍在为如何消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绞尽脑汁的同时，部分地区又频繁出现了“民工回流”、“民工荒”现象。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显著的特征是“半城市化”和“往复式迁移”现象，明显迥异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过程。绝大多数农民工并不一定准备在流入地定居，他们把家庭留在原籍乡村，自己则根据工作机会四处流动，如果挣了钱，就回到原籍乡村盖房子、结婚。或者，他们“流而不迁”，“像永恒的钟摆，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来回摆动”。

以我国特殊的转轨过程和制度环境为背景，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我们尝试建立的是一个解释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微观模型，模型侧重分析家庭禀赋改变劳动力迁移预期以及投资回报率（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的条件下，劳动力如何通过方向不同的迁移决策来回应制度约束，改善自己的长期福利。

理论推导和经验验证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家庭禀赋的长期保障效应和投资回报效应是当前部分迁移劳动力主动回流农村的主要动力，而长期保障的缺失也是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关键障碍。第二，农村迁移劳动力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不仅仅考虑当期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还会考虑长期保障，为以后生活做长期打算。将长期保障变量引入迁移决策模型，改变了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均衡条件。第三，从家庭禀赋作为个人发展能力拓展的视角来看，

家庭禀赋可以使得迁移者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家乡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并且家庭禀赋的经济效应只有在迁移者家乡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和实现。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和外界制度条件的约束,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主要是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多年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得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有所积累,但是他们在城市部门向上发展的空间和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几率很小。而这种积累在返乡后可以盘活家庭已有的资源禀赋,可以使得这些积累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第四,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不能获得长期保障,就很容易选择回流,或者是在城市和农村间往复式迁移,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城市部门中实现更高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还可以维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的长期保障。

应该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和回流。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劳动力可以更好地利用农村家庭禀赋。各级政府应该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提供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构建就业信息交流平台,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流出地政府应通过对回流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政策扶持,改善农村融资环境,提高他们回乡创业能力和多方位发展的机会。

城市部门应该重视对迁移劳动力长期保障的提供与维护。从“民工潮”到“返乡潮”和“民工荒”,其背后折射的是这一特殊的职业群体长期保障的缺失,这也是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难点和重点。长期保障的重点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应建立流动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让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正规部门劳动力一样享受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地方政府应以居住地 and 就业地配置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政策,在尊重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意愿的基础上,根据迁移劳动力需要,遵循自愿、合意的原则,通过市场手段稳步推进人口城镇化。

8.研发投入对企业 TFP 的溢出效应

李静 彭飞 毛德凤(合肥工业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近年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中不断成长,自主创新意识不断增强,研发创新发展氛围逐步推进,正在成为构建产业竞争优势的支撑力量。但是,我国工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弱,特别是企业创新能力建设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研究能力仍处于初期阶段,还未成为实质参与国际创新竞争的现代市场力量: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一些欠发达地区研发投入水平明显偏低。二是覆盖面较窄。2005-2007年全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统计显示,实施研发行为的企业仅占全部样本企业的不足10%。三是研发密度普遍偏小。2007年,我国工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工业增加值之比仅1.44%,而同期的美国和日本已分别高达2.67%和3.58%。四是研发激励不足。多数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研发对企业增强竞争力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或虽认识到重要性,但限于低端产业,对如何进行产业升级以及在此过程中研发对产业创新或升级的激励不足。

研究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贡献离不开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较多忽视研发投入与生产率之间的自选择关系,也就是用生产率高的企业解释高研发投入之间

的关系，很显然这种做法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结论要么高估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贡献，要么得到相反的结果。而我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对 2005-2007 年全国工业企业进行匹配分析后发现，研发投入对生产率具有显著为正的效应，约为 16.5%，表明只要有一定的研发活动都会带来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研究还发现，研发的生产率效应依据不同的行业、企业属性和地区不同而变化较大：高新技术行业、国有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研发溢出效应最为突出；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

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研发投入对于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在经济和政策上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从长远发展眼光看待研发投入。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扶持力度；而企业应重视生产经营，从而积累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利用研发提高并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从区域研发对策选择上，对于东部地区企业，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企业依靠自身原创性技术成果来增强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中西部地区，政府应改善企业自主研发的外部环境，并把扶持政策措施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另外，由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能源较为丰富，而东部地区企业的研发基础较扎实、资产流动性较强，因此，可建立稳定的研发合作关系，通过强强联合来发挥各自优势，这对于我国区域生产率的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再者，从企业自身优势上，充分利用大型国有企业的研发力量和规模优势，推动重大科技研发创新；同时，发挥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法人企业自主研发人才、资金和技术的政策支持力度，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当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绝大多数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较小或还未从事研发活动，这些都会弱化其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因此，企业研发支出应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争取发挥其最大效应。

9. 论货币数量规则的有效性

吴吉林 黄辰（山东大学）

《非线性“麦卡勒姆规则”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检验》，《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麦卡勒姆规则”是货币政策操作的一项基本规则，它以基础货币为中介目标，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基于日本以及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宏观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以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麦卡勒姆规则”能有效的降低通货膨胀率以及减少产出的波动。进入本世纪以来，虽然欧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逐渐转向基于利率工具的“泰勒规则”，但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利率行政管制约束，以调节货币供给量为基础的“麦卡勒姆规则”比基于调节利率的“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刻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特征。

我国属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利率行政管制的约束，利率市场化进程较晚，相对来说在我国还是货币数量规则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中央银行每年初都会公布相应的货币供给目标，而且当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时，中央银行更多的时候还会动用存款准备金等货币规则工具来对经济进行调控。因此从货币政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以调节货币供给量

为基础的“麦卡勒姆规则”比基于利率调节的“泰勒规则”应该可以更好地刻画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特征。

但基于理论的许多研究发现，“麦卡勒姆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拟合效果不甚理想，甚至还要差于“泰勒规则”，难道理论的研究结果和现实相违背吗？这里存在的可能原因是：传统的“麦卡勒姆规则”主要是线性模型，但在现实经济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偏好也在不断进行着相应的调整，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具有不同的侧重。因此，货币政策函数可能表现为非线性时变特征，传统的线性模型难以刻画货币政策操作的这种非线性动态调整特征。我们正是从非线性角度来重新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特点。基于 1983 年第 1 季度至 2011 年第 2 季度的通货膨胀率、GDP 增长率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我们重点考察了不同通货膨胀机制下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缺口、产出缺口间的时变非线性关系。结论显示中央银行的确会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对货币政策的调节力度与方向不断进行调整，在通货膨胀的三个不同区间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节特点都不一样，这主要表现在：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政策的调节具有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运行的双重作用；在温和通货膨胀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虽具有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同时更倾向于增加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增长；在高通货膨胀机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更关注抑制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几乎不关注经济增长。

上述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是，货币政策的实施决策是极其复杂的，离不开中央银行的审时度势和敏锐判断，一成不变的程序化规则难以在实践中有效实施。中央银行应该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灵活地进行相机抉择。特别是当通货膨胀率进入温和通货膨胀区间时，中央银行有动机增加货币供给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偏重产出增长的行为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偏差和稳定性偏差，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从而使得通货膨胀率超越温和反应区间。因此，在面对温和通货膨胀环境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在处理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应更谨慎，特别是当通货膨胀率逼近高通货膨胀机制时。当前，面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我国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将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加复杂。在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更需注意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现。

10. 中国货币替代程度及其对福利的影响估计

吴锦顺（厦门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货币替代是指国外货币在本国境内替代本国货币充当价值标准、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等职能的一种现象。货币替代程度会受到本国通货膨胀水平和外汇管制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货币替代程度在某些国家是很低的，仅仅只是居民手中持有的少量外币存款（外币充当价值储藏手段职能），而有些国家货币替代却很高，甚至实行完全“美元化”（即允许美元在国内充当一切货币职能，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

通过建立模型,并采取参数估计的方法,笔者测算出中国 1993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的平均货币替代程度为 0.03,说明从外币在我中国发挥职能的角度来看,中国货币替代程度并不高。

货币替代程度变化对于福利具有双重影响。首先,货币替代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政府铸币税收入的减少。由于更多的居民愿意持有外币存款,放弃持有本币存款,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而获取的铸币税收入理所当然就减少了。利用铸币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表示由于货币替代而引起的铸币税损失大小。通过模型测算可知,铸币税损失最高年份为 1997 年,其损失占 GDP 比率为 0.47%,最低年份为 2004 年,铸币税损失占 GDP 比率为 0.07%,而一般年份都不会超过 0.2%。其次,货币替代程度的增加会增进居民的福利。由于国内发生通货膨胀,本国货币会丧失部分价值储藏职能,本币贬值会导致居民福利的降低。如果居民把本国货币存款及时转换为外币存款,其财富得到保值,从而增加了居民福利。另一方面,持有数量一定的外币可以减少对外贸易中由于频繁的本外币转换而增加的交易成本。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替代程度提高可以增加居民福利。通过模型测算,用居民从货币替代中得到的盈利占 GDP 的比率表示居民福利。由于货币替代导致的居民福利增加最高年份为 2000 年,与 GDP 占比为 0.87%,最低年份为 2010 年,与 GDP 占比为 0.7%。2005 年以前一般在 0.8 左右,2005 年以后一般在 0.7%~0.8%之间。

就全社会来看,货币替代对福利的影响为居民福利增加部分减去政府铸币税损失部分,即货币替代给社会带来的净福利,最高年份为 2001 年,达到 0.71%(占 GDP 比率),最低年份为 1997 年,为 0.36%,一般都在 0.6%左右。

通过以上分析和估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从货币的职能角度来看,货币替代程度是十分低的,外币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我国近十多年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国 2005 年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我国相对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导致我国本币与外币之间的可替代程度是比较低的(经过测算货币替代弹性系数为 0.59)。从居民福利的角度来看,货币替代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居民福利的增加,而且在相同货币替代程度下,居民福利的提高远大于政府铸币税损失,所以货币替代尽管会给政府带来铸币税损失,但总体上给我国带来的是福利水平的提高。

货币替代会导致国内货币需求不稳定,妨碍对经济前景的预测,事关政府货币创造的收益和居民的福利,所以货币替代程度及其对福利影响的估计对于货币当局制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要放松外汇管制,藏汇于民。货币替代程度提高对居民福利的增加远大于政府铸币税的减少。从增进居民福利角度来看,应该允许民间持有更多的外币。其次,如果要减少货币替代程度,政府应该做的是更加关注本国货币的稳定,而不是一味地限制居民持有外币量。

11. 国家发改委成品油调价对能源类股票收益率的影响

柳明 杨运泽 孙文鑫(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石油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能源,既是一国经济与政治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又影响着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石油价格也被作为衡量金融市场乃至全球经济衰荣的一项重要指标。与国际上连续的石油价格变动不同,我国的石油价格是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来进行调整的,例如今年3月27日,发改委将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了310元和300元;4月24日汽、柴油价格每吨继续降低395元和400元;5月10日将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95元。通过参考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并结合国内的供需要求,发改委对我国国内的石油价格进行非连续性的调整。2006-2012年是发改委变动油价较为频繁的几年,通过发改委的调整,我国国内的油价也基本与世界市场的油价保持着较为一致的关系:国际油价上涨时,国内也进行涨价调整,国际油价下跌时,国内也相应下调油价,但国内的调整多滞后于国际市场的变动。

石油价格的波动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变量的变动。在微观层面,油价的波动会对能源行业类企业经营状况带来影响,并通过市场与价格链条将这种影响扩散开来。能源类个股的股票收益率是衡量石油价格波动对微观经济变量影响较好的指标。石油价格的变动能够被资本市场较快地吸收,并通过股票价格的波动表达出来。因此,通过分析个股股票收益率的变动,我们能够较好地把握油价波动对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根据产业链的不同位置和对石油需求的不同,我国A股市场将能源类股票分为4大类: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类,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类,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类和煤炭采选业类。4类股票分别代表着位于石油产业链上、中、下游和替代类企业,不同类别的企业对油价的波动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对其进行分类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影响。

事件分析法是针对非连续数据变动进行分析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通过将每一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看作一次事件,分析事件前、中、后期能源类股票收益率的变化,进而判断油价调整事件对微观经济主体带来的影响。

2006-2012年间共有24次油价调整事件,剔除掉相隔时间较近、调整幅度较小的10次事件,剩下的14次事件中有8次价格上升事件,6次价格下降事件。利用事件分析法对这14次油价调整事件进行分析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类,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类股票收益率对成品油价格变动不敏感。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板块的企业多具有较强的垄断性,受外部经济变量干扰程度较小,同时石油是其产出物,在当前对石油处于绝对需求的世界市场中,成品油价格的变动对企业的经营效益不会产生过大的影响。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类和煤炭采选业类股票收益率对成品油价格变动较为敏感,油价上升事件使其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油价回落促使股票收益率上升。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板块的企业多处于垄断竞争状态,个股更容易受到市场信号的影响。对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类企业,石油是原材料,石油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企业经营的成本,通过资本市场反映到股票的收益率波动中。煤炭虽然在用途上可以作为石油的替代品,但煤炭采选业类的企业多是能源消耗型企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石油作为动力来源,所以石油价格的波动也带来了煤炭类股票收益

率逆向的变动。成品油价格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提前或滞后，油价波动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一个时间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这主要是因为世界石油市场价格调整在前，使我们的市场产生了一定的预期。同时信息的泄露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股票价格的提前反应。

通过研究国内成品油价格波动对能源类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油价变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对其带来的风险与波动进行预判，对政策的制定和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2. 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就业效应的地区差异——基于地区 CO₂ 结构偏离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张金英 石美遐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欧美等发达国家视低碳经济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试图借此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攻坚阶段，国情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盲目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造成就业损失。如何抑制低碳经济对就业的负面效应，并借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就业增长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低碳经济政策手段有约束型和激励型两类，我们主要分析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对就业的影响。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首先，不同地区可能会采取不同类型的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政策执行力度也可能不同，因而对企业生产成本及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不同，对产量、收入、消费需求水平及就业产生不同影响。其次，不同地区的消费结构存在差异，有些地区消费结构中高碳排放产业的产品所占比例较大，在这一地区采取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较大。

我们用地区 CO₂ 结构偏离度系数反映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差异程度，计算方法是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与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的比值减去 1。2005-2011 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地区 CO₂ 结构偏离度系数及各年均值为正值，说明这些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比重比就业比重高，我们将这些省份划分为 I 类地区。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的地区 CO₂ 结构偏离度系数各年均值为负值，说明这些地区 CO₂ 排放比重小于就业比重，我们将这些省份划分为 II 类地区。

我们对两类地区采取提高能源价格和增加污染治理投资这两种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的就业效应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就总体而言，两类地区的就业量与化石能源消费量都是正相关的，这预示着依靠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量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会减少就业，而且，II 类地区所受到的就业减损比 I 类地区大。第二，提高化石能源价格对两类地区的就业均会造成负面影响。第三，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可推动 I 类地区就业增长，但是对 II

类地区就业增长会造成负面影响。

政府制定和实施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应当兼顾减排目标与就业目标,努力消除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首先,要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与责任,合理的政府干预应该建立在充分的市场信息和科学的管制标准之上,搞清楚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企业可以承受的污染控制标准和排放率是什么,并且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选取适合于促进就业的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其次,在就业量受冲击较大的地区构建低碳经济的劳动力蓄水池,政府通过直接投资或者提供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激励私人投资建立低碳就业功能企业,这些企业从事以防治污染、改善环境为目的的环保产业生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服务、低碳知识宣传等活动,其功能是临时接收由实施低碳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失业人员,为其提供免费的低碳工作技能培训、较为公平的劳动报酬和法定的社会保障,当其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或者社会就业形势变好后,可以自由转换工作单位或职业,或者按照政府设计的流动渠道转移到赢利性的低碳企业工作。再次,合理搭配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与激励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借鉴国外经验,在实施低碳经济政策时可以搭配劳动税收减免措施,激励企业用劳动力替代能源投入,可以减弱约束型低碳经济政策手段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实现节能减排和促进就业双重红利。

13.从省际贸易成本看我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

许统生 洪勇 涂远芬 黄光明 (江西财经大学)

《“入世”后中国省际贸易成本测度、效应及决定因素》,《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与1992-2002年中国省际贸易成本上升大约8%的情况相反,2002-2007年间省际贸易成本下降了大约3.5%。这可能是因为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更多地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之中,对外贸易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使本国市场对内更为开放,促进省际贸易成本下降,提高了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无论是从省际贸易成本与对外贸易成本的比较、中国与国外省际贸易成本的比较,还是省际贸易成本相对于对外贸易成本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省际贸易成本都比较高。此外,在全国平均的省际贸易成本下降的大背景下,部分省份的省际贸易成本却有所上升,东部地区省际贸易成本上升的省份包括北京、浙江、山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江西和湖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和青海。这些地方2007年的省际贸易成本相对于2002年的省际贸易成本都高于100%。导致这些地方省际贸易成本上升的原因是:2002-2007年期间这些地区内部贸易的快速增长替代了部分省外调入和省际调出,使得这些省省外调入的增长低于中国其他地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贸易增长,以及这些省省际调出的增长低于其内部贸易的增长,从而导致省际贸易成本上升。各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降低省际贸易成本,打破地区市场分割现状,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

从贸易成本区域分布看,省际贸易成本在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东、中、西部地区这种省际贸易成本现状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格局密切相关,因为一个地区对外开放

程度越高，其对内的开放程度也会越高。企业对外贸易出口比重越高，其进入特定国内市场的可能性也越高；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 WTO 规则的基本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开放“倒逼”与推动下深化拓展。因此，为了降低省际贸易成本、提高我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各区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对外开放带动和促进对内开放。从贸易成本的产业分布看，工业的省际贸易成本远低于农业与服务业，也低于总省际贸易成本，表明工业制成品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最高，服务业和农业的一体化程度较低，服务业的省际贸易成本较高是由服务项目不具有可贸易特性决定的，而较高农产品省际贸易成本是由农产品较高物流成本造成的。故要降低农产品的配送成本，发展节能冷链物流方式。

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看，省际贸易成本下降对省际贸易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其对省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度不及收入增长的贡献度。因此，首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间开展省际贸易，同时，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省际贸易成本高的地方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使省际贸易成本迅速大幅下降，以扩大内需和加快国内商品流通，促进省际贸易增长。

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对降低省际贸易成本具有显著作用，因此，要继续加大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省际贸易成本、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这在当前扩内需、保增长的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另外，为了降低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倾向，可以在不降低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控制力的条件下，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

世界经济研究

14. 美元区位分布的条件与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

丁一兵 钟阳 (吉林大学)

《美元区位分布的条件及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全球贸易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在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然而历史经验表明仅仅具备实体经济方面的条件尚不足以实现一种货币的国际化甚至区域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探讨和思考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以便设计出合理可行的货币国际化推进战略。这其中,网络外部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

就货币国际化这一领域而言,网络外部效应主要是指随着世界上更多国家与某一货币发行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导致其接受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时,这一国际货币对原已接受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加,从而对该货币的国际化产生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空间溢出效应则是指一个国家与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联系密切程度以及相应的对该货币的接受程度会影响到邻近国家对该货币的接受。如果网络外部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则对于力图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可以有意识地利用空间溢出效应,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合理切入地域,促进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的辐射水平,最终形成集群效应,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考察现行国际货币的外部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揭示国际货币更替面临的困难,有利于中国认清国际形势,制定理性的战略目标及战略规划,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长期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都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对于不同国家而言,美元的地位与重要性也存在一定差异。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美元所能提供的借鉴之一就是其区位分布的特征以及决定这一特征的因素,尤其是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对于确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首先,一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越大,其外汇市场参与者越青睐于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这表明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仍然是决定和影响货币国际化的一项基本因素。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与一国相邻的周边国家(地区)同美国的实际双边贸易额越大,该国也会越倾向于使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货币,这意味着在美元国际化过程中通过双边贸易这一渠道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在地区间形成了互补关系,一国同美国贸易联系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国家对美元的接受,其原因在于,一国与美国进行大量的双边贸易时,该国可能会获得或将支付大量美元,而同时为了使用或获得相应数量的美元,该国自然会倾向于在其共同周边国家进行贸易时以美元作为支付手段,这样美元在周边国家的交易量自然会随之增加。这一空间溢出效应实际上反映了美元在境外使用中的网络效应。另一方面,,相邻国家由于竞相吸引美元在各自外汇市场交

易，也会形成一定的竞争效应。

美元区位分布中的上述效应，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安排的重要启示在于：一方面，为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我们需要继续扩大并巩固对外贸易，进一步增加对外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或结算的份额，现阶段可以首先在中国周边国家乃至亚洲区域内进一步加强同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在特定区域内以贸易为载体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进而逐渐通过贸易渠道形成空间溢出效应，增强人民币的辐射力，使之扩散到其他区域，同时通过相应的政策导向，扩大通过贸易渠道实现的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积极影响，尽量减小竞争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元作为现行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及其区位分布中的空间溢出效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也需要有意识地选择美元地位相对较为薄弱、与美国经济联系相对松散的国家或区域作为突破口。

15. 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政治经济学

周克（西南民族大学）

《美元汇率政治经济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关于人民币重估的新一轮争论。紧接着，争论转变成升值压力。这种压力在随后的时间里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2005年7月21日和2010年6月19日进行了两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已经超过30%。然而，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和中美贸易失衡并没有得到改善，人民币面临着持续的升值压力。

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吗？现存的理论和实证都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研究过于注重经济因素，而忽略了政治因素对汇率的影响。实际上，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存在一个重要而明显的规律，就是当美国等主要工业国经济陷入内外部失衡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会增加。汇率是否低估对此不能解释。在解释日元持续升值的原因时，McKinnon 和 Ohno（1997）指出，传统汇率理论失效的原因在于这些理论将国际金融研究与贸易变动、商业政策以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

美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一贯的，不同的只是干预方法和侧重点。进入21世纪，美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虽然在表面上停止了，但是通过双边协商和政治施压的方式进行干预却越来越频繁。具体来说，美国的进出口竞争部门通过把预期政治资助与现任政府所选的汇率水平相联系的方法提出利益诉求。政府则通过选择汇率水平来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总社会福利和政治资助的加权和。当经济失衡对进出口竞争部门产生不利影响时，他们会游说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政府会权衡厂商和消费者的福利情况进行外汇市场干预。

这意味着，均衡汇率不仅取决于生产和消费的性质，还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对政治力量。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表明，当美国经济内部和外部同时失衡时，美国政府很可能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运行状况和美元贸易加权

汇率变动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当美国经济同时陷入内外部失衡时,美国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的概率将提高 23%~32%。换言之,当美国经济遇到问题时,美国很可能会向其贸易伙伴国施加升值压力,这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是否存在低估无关。

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在于市场形成的升值预期。升值预期推动了资本大量流入,不仅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影响,而且把利率压到较低的水平,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短期,资本流入和低利率容易引起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在长期,如果国内外需求大幅下降,很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和通货紧缩的困境。日本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结论。前车之鉴,不能不防。

以双顺差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外部失衡,既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进行纠正。然而,如果将其归因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并试图通过汇率调整来纠正,很可能犯了惯性思维的错误,即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理解存在许多政策干预的经济。在自由市场中,汇率和外部失衡可能关系密切。但是,当存在诸多政策干预时,它们的关系可能被瓦解了。使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非市场因素导致的问题,无异于是在扭曲一种政策来纠正另一些政策的扭曲。

只有找到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真正原因,才能够彻底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既鼓励出口又鼓励资本流入)、廉价的劳动力、预防性储蓄较高、收入分配不公平等,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国国内的高消费等。改变制度性因素是困难的,因此,失衡将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很可能是持久的。

16.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附加值贸易:还原真实的国际贸易

王岚(天津财经大学)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和应用》,《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随着通讯和运输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割成为当今国际分工的显著特征。新型分工体系下,一国专业化从事的不再是产品的生产,而是价值链上的特定环节。价值链在不同公司和不同地点之间的切割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于相互承接的生产以及贸易环节,在这个过程中供应链上的各个国家创造产品和服务,将其以投入品的形式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后再出口,这一过程会在最终产品达到目的市场时结束。在这种分工体系下,传统贸易统计体系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增值都统计在价值链最后一个环节显然会导致统计偏差,从而影响分析贸易本身及其对贸易政策的潜在影响。

全球价值链分工新型贸易统计的需求日益迫切。2011 年“附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由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日本发展经济研究所(ID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联合提出。附加值贸易体系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使它可以帮助解决现行

贸易统计的三方面问题：首先，当产品为了进一步加工多次在国家间流转时，相同劳动、资本以及中间品的价值就会被重复计算，而由重复计算中间品产品和服务导致的贸易水平高估在特定产品和服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次，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间品贸易的迅猛发展使贸易对国家福利水平的实际贡献难以确定；最后，现行贸易统计体系无法揭示价值增值的来源，而附加值贸易通过对国内价值增值的部门分解，有助于客观评价国际竞争力的真实来源。考虑到中国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可以预期用附加值贸易调整后中国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将大幅缩减，这一点将有效改善中国面临的外贸环境，避免中国出口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众矢之的”。

附加值贸易在垂直专业化基础上，放松了垂直专业化测算过程中的两个关键假设：其一，当存在加工贸易时，国内最终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生产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无法保持一致，因为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其二，中间品在国家之间的迂回流转导致一国进口中间品并不完全是由国外价值增值构成的，因为还存在本国向另一国家出口中间品，经后者加工后再返销给本国的情况。根据附加值贸易框架，一国出口可以分为四个部分：（1）包含在最终产品中的国内价值增值；（2）包含在中间品出口中并被他国消耗的国内价值增值；（3）国内价值增值的回流部分，这部分是包含在一国中间品出口中后又经进口国返销给本国的国内价值增值；（4）表示总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1）和（2）的加总等于一国附加值总出口，（1）、（2）和（3）的加总则为一国出口中的国内成分，（3）和（4）加总则是传统贸易统计中重复计算的部分。附加值贸易的测度需要准确界定价值链在国家间的分布，需要测度各国对最终产品价值增值的贡献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投入产出表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而 2012 年 5 月对外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通过整合不同来源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并结合贸易数据，形成了世界投入产出表，这极大地推动了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应用。

附加值贸易通过还原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真实贸易格局，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和应用前景。首先，附加值贸易统计通过调整现行贸易统计在贸易差额上的偏差，为各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解决全球失衡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其次，附加值贸易表明，全球价值链上的各国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投入产出关联，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贸易政策的效果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因此政策的实施和效果评价需要更加审慎；最后，附加值贸易通过对贸易中不同来源价值增值进行分解，完成了对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基因图谱”的绘制，有利于厘清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局面，同时也有利于发掘竞争力的真实来源，帮助各国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国际竞争政策。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2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 (<http://jer.whu.edu.cn>) 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